



惠州学院
HUIZHOU UNIVERSITY

惠州学院经济管理系

2011年度学术会议

论文集



目 录

基于信息经济人假设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研究~~~~~	张 敏	1
Research Summary Report Professor Robert Lynn Ogden Department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Huizhou University December, 2011	~~~~~Lynn	11
重视和强化学生社会实践和学术(专业)竞赛~~~~~	胡瑞卿	13
惠州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比较分析~~~~~	刘薰词	16
基于宜居视角的惠州市房地产营销策略研究~~~~~	王兴邦	24
惠州统筹城乡发展的路径选择和政策建议~~~~~	朱永德	31
大学教师岗位管理的价值选择~~~~~	曹仓 徐宁 张敏 陈刚	42
财政农业支出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吗~~~~~	李普亮	48
美日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比较研究~~~~~	杨 荣	66
分享与增长:民生财政与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汤跃跃 张毓雄	73
Generalising double jeopardy relationship to Chinese radio market ~~~~~	李 芳	81
David Craig JACKSON MA, FCMA, DESS, Associate Professor Dept.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Huizhou University Research Paper	~~~~~David	93
我院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问题研究~~~~~	江新泉	99
广东省农村县域金融服务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韩韵琴	108
怎样治理新的逃避增值税行为~~~~~	陈汉亭	112
民间竹文化的传承与竹产业的发展~~~~~	张毓雄 汤跃跃	116
应用型本科院校审计教育模式研究~~~~~	柴 静	123
企业员工主观幸福感的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徐 宁	126
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创新区域竞争力评价研究~~~~~	郭 萍	131
高校基层党组织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思考和探索~~~~~	陈少玲	141
地方高校学生党员教育培养存在问题分析与研究~~~~~	邬 强	145
基于STAR模型的中国宏观经济周期拐点的识别与预测~~~~~	谢鸿飞	148
资本市场与我国居民消费关系研究~~~~~	唐静武	159
经济责任审计体系研究:回顾及启示~~~~~	刘 武	168
面向物流业的ERP软件选型分析与评价研究~~~~~	王少君	173
企业模块化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胡玉洲	182

应对自然灾害的多级应急资源布局模型与算法	张 玲	190
长江水运研究30年综述	何远成	198
前景理论下损失厌恶型零售商的广告—订货策略	刘 珩	203
农村集体经济审计初探	汪 洋	210
小企业自主创新路径研究	齐韦存	216
广东省个人住房信贷审计研究	袁祥勇	219
《世界经济概论》教学法综合运用试探	卢晓园	229
加强公路系统内部会计制度实施策略研究	李春歌	232
财务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现状与目标定位研究	王 琼	235
惠州市产业结构调整中金融支持现状与问题研究	黄文娣	237
中国农产品贸易模式的动态演进	余学军	240
论当前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下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模式的转变	庄 核	245
广东省价格贸易条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吴丹涛	254
我国物流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王发良	261
惠州市发展物联网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谈海霞 张 敏	266
广东碳交易市场研究	李文辉	274
贸易结构转变、要素市场扭曲与要素收入分配	陈秋锋	279
基于食品质量安全视角的连锁超市生鲜食品冷链物流问题探析	贾卫丽	286
离婚协议中对未成年子女赠与条款的性质	陈 刚	292
保护贸易理论的发展及比较研究	李 蓉	295
论网络传播下的高校校报优势创新	张小俊	299
高校财务管理专业实验教学改革与创新路径选择	李 红	303
地方高校设立创新学分的若干思考	邓淑容	306
当代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祝 琳	309
关于高校政治辅导员特殊地位及其素质体系的一点思考	陈雄辉	312
农业补贴政策对增加农民收入的影响	黄 迎	316
惠州学院经管系实施双学位辅修本科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强亚君	322

基于信息经济人假设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研究

张 敏

(惠州学院 经管系 广东 惠州 516007)

摘要: 基于人类的合作本性以及信息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借鉴西蒙的有限理性学说, 提出具有主动合作特性的经济行为人假设——信息经济人假设。并借鉴场理论构建组织信息场模型, 将经济组织的资本信息和价值取向信息作为组织信息场的主要变量, 从而将经济因素和文化道德因素纳入同一个框架内进行分析, 试图以合作的视角、信息的观点、系统的方法来描述经济人在组织中的合作机理, 分析维持合作的基本条件。运用此模型分析了我国目前几种主要的农产品供应组织模式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联, 探寻我国农产品供应链的合作机理及管理模式的创新方向。

关键词: 合作; 信息经济人假设; 组织信息场模型; 农产品供应链组织模式; 农产品质量安全。

一、引言

自 2006 年以来, 我国爆发了几起影响范围较大的食品安全事故, 如致癌大闸蟹、“苏丹红”鸭蛋、奶粉掺杂三聚氰胺、瘦肉精等, 也由此引发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研究热潮。这些研究涉及政府监管、组织创新以及技术创新等方面, 并提出了相关策略。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 加强政府对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环节的质量安全监管。但是, 到目前为止, 这些努力并未收到显著的效果, 而且在理论层面还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许多研究结果将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案聚焦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政府管理职能的进一步加强等等。而温家宝总理在近几年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谈话中也多次提到“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 而不能只流淌利润的血液”这个话题^[1]。这种分歧的产生是由于道德因素并没有纳入我国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视野。

在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理论探讨中, 对于人的经济行为模型多采用西方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在理想的市场条件下, 理性经济人从利己的动机出发, 在价格机制的协调下, 可以实现良好的社会分工与协作, 这就是“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是, 理想的市场, 其条件是很苛刻的, 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 现有的市场制度都有不同程度的缺陷, 理性经济人在追逐个人利益时, 就可能会损害公共利益。以我国农产品生产流通现状为例, 我国基本上是由分散的小农户进行农产品的生产和初级加工, 而由资本实力雄厚的大型涉农企业从事农产品的深加工和流通。在一个不够完善的市场机制下, 如果单纯地依靠“看不见的手”进行社会分工与合作的协调, 必然会出现大资本对小农户的利益挤占现象, 如果小农户的利益受到大资本的过度侵占, 那么, 在农产品的最基本环节——生产环节的质量安全将难有保障。而这种利益侵占还会进一步加剧小农户在资本市场中的弱势地位。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 如果强势过强, 弱势过弱, 必然会引发更为严重的信誉危机, 进而影响社会稳定^[2]。因此, 我国政府在对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流通环节都有相应的政策对小农户的市场地位加以保护, 以维护小农户的基本利益, 而且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农业保护政策。但是, 当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失灵时, 如果仅仅依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进行纠正, 仍然会出现问题。因为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 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 政府人也是理性经济人。显然, 由理性经济人组成的市场会失灵, 那么, 由理性经济人组成的政府同样也会失灵, 而且表现得未必会比市场更好。因此, 理性经济人只能在理想的市场条件下才有完美的表现, 而在现实的市场条件下, 可能会导致很糟糕的结果, 甚至是市场崩溃。

当然, 这一结论并不是说市场机制很糟糕, 只能说目前这种分析方法很糟糕, 因为, 现实中的每一个人都同时承担着多种责任, 扮演着多种角色, 这种角色之间的切换并不是绝对清楚, 界限分明的, 而是相互关联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只是从人的经济行为层面进行简化分析, 得出的结论只适应这一个孤立的层面。而现实社会的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密切关联, 不能简单地以一个孤立层面的理论来解释完整的社会经济活动。虽然有部分学者试图将道德文化等其他社会因素纳入经济学的分析, 但仍然是以理性经济人作为人的基本行为假设。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 无法解答温家宝总理提出的道德血液问题。温家宝总理在 2010 年两会期间对农民委员提出建议: 农业龙头企业在收购农产品时, 除给农民应给的报酬外, 还应将利润返还给农民一些, 并且指出这就是企业家身上也要流着道德的血液^[3]!

在不健全的市场条件下, 过分强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 不仅不能弥补现有制度的缺陷, 还会引发道德危机。特别是植根于西方文化的理性经济人, 其凸显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与东方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同舟共济

的群体精神的价值观是相互背离的,也与我国建设和谐社会价值体系不完全兼容。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寻求一种创新,突破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局限,将道德因素纳入经济活动的理论分析中,解释真实的社会经济活动。

二、信息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及组织信息场模型的建立

(一) 信息经济人假设的提出

考虑到在经济活动中除了个人参与市场活动和政府监管市场活动之外,还存在大量的经济组织参与到市场活动中。按照科斯定理,这些组织的存在首先就是为了解决市场低效率的问题,因此,在这些组织内部、组织成员之间的经济活动的互动关系,就与在市场交易中陌生人之间的经济互动关系有明显的不同,否则组织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无论是市场交易还是组织内部协作,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核心问题是分工与协作,即,无论在组织内外,熟悉与陌生合作是现代经济活动的根本模式。不同的经济活动组织模式,只是其实现合作的方法不同而已。在市场交易中,相互陌生的经济人之间要建立合作,必然是建立在利益计算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双方在利益上达成双赢的局面,合作才能实现。而且这种合作关系的稳固性与利益计算的清晰性是有密切关系的,当存在利益计算的模糊性时,合作的稳定性会受到影响。随着收益不确定性的增加,合作失败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对市场经济中“我”与“非我”之间的合作现象,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经济分析可以给出明确的解释。

但是,在一个经济组织内部,其成员之间也会产生合作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合作建立的条件是什么呢?显然不能完全依赖于利益计算,因为在一个经济组织内部有许多利益关系是计算不清楚的,或者说要花很大成本才能计算清楚。因此,维护一个经济组织的良好运作,除了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利益驱动之外,必须还要有其他的动力来维护,否则,这个组织是无法维持的。实际上,任何一个运作良好的经济组织都具有明确的组织文化,其员工都有明确的组织认同感。一般而言,当一个新员工进入组织后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认同问题,而且是双向认同,只有当他真正成为组织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后,才能顺利地开展工作,施展自己的才华创造应有的价值。在组织内部的合作正是基于这种组织认同感而进行的,当组织中的个体都具有强烈的组织认同感时,组织内部员工之间的合作就是“我”与“另一个我”之间的合作,影响这种合作稳定性的关键因素不是利益关系计算的清晰程度,而是员工对组织的认同程度。当认同感足够强时,合作可以轻易超越短期利益关系的制约,而当认同感低于一定限度时,合作又只能回到基于利益计算的基础上。

显然,在一个正常的经济组织中,其合作现象与市场交易中的合作现象有明显的区别,试图用理性经济人假设来分析这一现象,大大弱化了组织文化的作用,忽视了道德因素的力量。

如果说,市场交易中经济人“我”与“非我”是基于利益计算所采取的被动合作策略,是仅仅以利益为唯一驱动力,这是一种低层次的合作。而在一个具有良好组织文化的经济组织中,经济人“我”与“另一个我”则是基于组织认同感而采取的主动合作策略,是以文化道德因素为主要驱动力,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合作。因此,有必要为这种组织内部的主动合作形式提供合理的理论分析,在这里,引入文化道德因素是必然的选择。此外,应当看到,即使双方都具有主动合作的意图,合作能否成功还取决于其他因素,其中,信息仍然是一个关键变量。因此,本文将具有主动合作意图的经济行为命名为信息经济人。

理性经济人假设在强调人的利己本性的同时,忽视了人的社会性本质。人的本性是社会性的,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开展合作和组织活动的趋势是其固有的本性。因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道德认同基础上的具有主动合作意识的经济行为人假设模型,该模型并不排斥利益追求,只是将利益追求与道德认同放到一个相互作用的层次上来进行分析。该模型借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些有效方法与原则。

(二) 信息经济人假设的基本原则

在尽可能真实反映经济人和经济组织活动机理的前提下,为了保证能够得出确定性的结论,对下面的有些原则给出了较为严格的限定条件。文章最后对这些限制条件做了简要讨论。

1、合作原则。经济社会是高度分工协作的,经济活动通过各种组织来完成。这里的组织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组织,其主要职能是协调个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具体形式包括市场、企业以及各种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中间型组织。经济行为人只能在组织中发挥作用,参与经济活动,不能独立于组织之外从事经济活动。经济行为人可以在多个组织中参与经济活动。

2、自愿原则。经济行为人与组织之间具有双向选择的自由。可以选择合作,也可以选择不合作。不

合作等同于退出组织。一旦经济行为人决定加入某一组织,则表明其在该组织中将采取合作的态度,并努力为组织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使组织获得更好的效益。自愿原则也表示,加入组织则意味着接受组织的合作规则,包括组织的收益分配规则,而具体的分配规则可以是多种方式,只要能够被参与组织的经济人接受即可,比如,可以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还可以是资本主义的按股权分配,当然也可以是某种混合方式。

3、信息原则。选择合作伙伴的依据是信息。然而,与合作相关的信息是繁杂的,是一种多维度的综合信息,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信息。其中,有些信息是可以量化的,如资本信息,包括实物资本、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等,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换算关系进行量化,从而可以相互比较,并进行累加,因此,可以用经济行为人所拥有的资本总量大小来考量其合作能力的大小,组织或个体拥有的资本量越大,合作能力越强。另一方面,经济人的思想道德、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也会对合作产生影响,而这些方面的信息是很难量化,很难相互比较的。经济人之间这些信息的异同程度会对合作产生直接的影响,差异越小,越容易合作。据此,做如下简化假设:

(1) 与合作相关的信息简化为 2 个方面的信息,分别是作为标量的资本信息和作为矢量的文化信息即价值取向信息。资本信息包括实物资本、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等。而价值取向信息包括思想道德、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资本信息以大小来决定对合作的影响,而价值取向信息则以异同来影响合作。

(2) 经济行为人在组织中发送的任何信息都是可验证的,即组织中没有虚假的合作信息。

4、有限理性原则。经济行为人与组织之间的双向选择体现了竞争的原则,竞争有利于组织提高效率。按照最优化准则进行选择,可以达到理论上的最佳效率,但实践中很难满足最优化选择的条件。因此,这里采取有限理性原则,即满意准则,并且双方都只对与合作有关的信息进行搜寻,寻找满意的合作伙伴。换言之,组织与经济行为人通过发送和接收合作信息来进行交流,进而相互选择。当经济行为人接收到某一组织发出的合作信息后,会将该合作信息的强度与自身的合作阈值进行比较。只有当该组织合作信息的强度超过阈值时,经济行为人才会选择加入该组织,参与合作,反之,则不会加入该组织。组织对于经济行为人的选择也是如此。

5、动态调整原则。在动态搜寻过程中,经济行为人会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调整自己的合作阈值及搜寻范围,从而保证解的唯一性与存在性^[4]。

6、稳定原则。合作信息强度的阈值判断具有继电特性,即,对于每一个动作阈值都有一个与之对应的返回阈值,且动作阈值大于返回阈值。例如,当经济行为人接收到组织的合作信息强度大于其合作动作阈值时,将会选择加入组织,参与合作。这时,如果组织受到外部扰动,导致合作信息强度发生一定波动,即使低于该经济行为人的合作动作阈值,但只要尚未低于其返回阈值,该经济行为人仍然会留在组织中,参与合作。只有当组织的合作信息强度低于其返回阈值时,该经济行为人才会选择中断合作,离开该组织。继电特性使个体对外部合作信息的反应具有一定的不灵敏性,但系统的稳定性却有所增加。

7、拓展原则。在经济社会中,合作是多层次的,既有组织内部经济人之间的合作,也有组织之间的合作,因此,上述各原则可以拓展到组织之间的合作过程。

(三)、组织信息场的数学模型

基于上述假设的基本原则,可以认为,每个经济组织在运行过程中都不断地向周围环境发送各种合作信息,主要包括:表征组织资本量(标量)的信息和表征组织价值取向(单位矢量)的信息,而经济行为人也以同样的方式向感兴趣的组织发送合作信息。双方通过合作信息的相互交流寻求合适的合作伙伴,进而建立合作关系。而且,在一个组织内部,为了维持现有的合作关系,组织内部各个部门之间,部门与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个体之间,都需要不断进行合作信息的交流。然而,组织与个人所发布的信息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传播的距离也大不相同,各种信息在空间上相互叠加,相互影响。因此,借鉴物理学的场理论,可以认为,每个组织以及每个经济人都具有一个以自身为中心的信息场,而组织的信息场实质上是其内部成员个体信息场集成的产物。

“场”是从大量的物理现象中抽象出来的一个物理学概念,它和某一特定的物理变量有着紧密的关系。所谓“场”,是指物理量在空间区域上的分布。“如果在全部空间或部分空间里的每一点,都对应着某个物理量的一个确定值,就说在这个空间里确定了该物理量的场。如果这物理量是数量,就称这个场为数量场;若是矢量,就称这个场为矢量场^[5]。”

由于组织信息场中每个节点发布的合作信息包括资本量 and 价值取向, 因此, 可借鉴静电场的库伦定律, 构建组织信息场, 即, 每个经济组织以及每个经济人都不断地向周围环境发出其所拥有的资本量信息和价值取向信息, 由此构成一个以其自身为中心的信息场。在空间中的两个经济组织 (或经济人) 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信息场力, 其大小与它们的资本量的乘积成正比, 与它们的信息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并且与它们的价值取向差异程度有关。其作用力的性质也取决于两者价值取向的异同程度, 价值取向基本相同, 相互间的作用力为吸引力, 即合作力; 价值取向基本相反, 则相互间的作用力为排斥力, 即分离力。其数学模型如下:

设: 组织的资本量为 Q , 经济人的资本量为 q ; 组织的价值取向为单位矢量 $\vec{V}_Q$, 而经济人的价值取向为单位矢量 $\vec{V}_q$ 。则组织信息场中的场力为:

$$F = k \frac{Q \cdot q}{r^2} \cdot \cos \alpha \cdot \vec{r} \quad (1)$$

其中, k 为信息场常数, 取决于组织与经济人所处的环境条件 (如信息发布与传播效率, 以及环境对信息的干扰程度等), r 为组织与经济人之间的信息距离 (反映经济组织和经济人之间位置变化所引起的信息传递的变化), α 为单位矢量 $\vec{V}_Q$ 和 $\vec{V}_q$ 的空间夹角, $0^\circ \leq \alpha \leq 180^\circ$, $\vec{r}$ 为场力的方向, 作用在两者的连线上, 其性质取决于单位矢量 $\vec{V}_Q$ 和 $\vec{V}_q$ 之间的空间夹角关系, 即 $\cos \alpha$ 的符号决定了 $\vec{r}$ 的方向, 当 $\cos \alpha$ 为正, $\vec{r}$ 指向对方, 场力性质为吸引力即合作力; 当 $\cos \alpha$ 为负, $\vec{r}$ 背向对方, 场力性质为排斥力即分离力。图 1 给出了 $\vec{V}_Q$ 和 $\vec{V}_q$ 的空间夹角可能呈现的几种典型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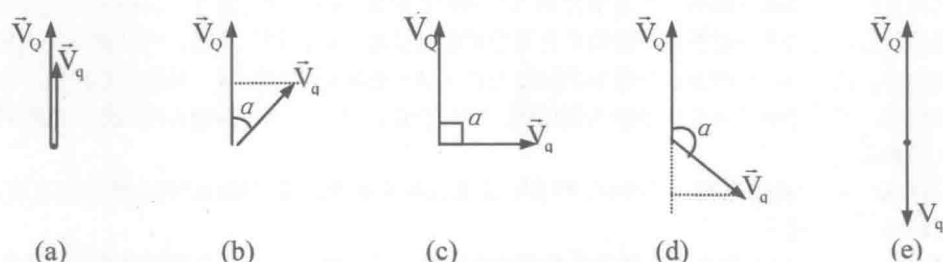


图 1 经济组织与经济人价值取向单位矢量关系示意图

根据公式 (1), 从图中可以看出, 当 $0^\circ \leq \alpha < 90^\circ$ 时, 场力 F 的数值为正, 如图 1 (a)、(b), 性质为相互吸引力, 方向作用在两者的连线上; 当 $\alpha = 90^\circ$ 时, 如图 1 (c), 场力 F 的数值为零; 当 $90^\circ < \alpha \leq 180^\circ$ 时, 如图 1 (d)、(e), 场力 F 的数值为负, 性质为相互排斥力, 方向也作用在两者的连线上。

本模型虽然是借鉴静电场理论, 但是, 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是经济人和经济组织价值取向的多维度性, 不同维度的价值取向之间既有有利于相互合作的因素, 也有不利于相互合作的因素, 而且有些价值取向与经济合作无关。因此, 两者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也不仅仅是相同和相反两种情况。为了便于分析, 本模型将每一个经济人或经济组织的价值取向简化为一单位矢量, 但不同经济人或经济组织之间价值取向的关系却可以在空间相差任意角度。因此, 该模型采取以经济人的价值取向单位矢量 $\vec{V}_q$ 在经济组织的价值取向单位矢量 $\vec{V}_Q$ 上的投影大小和方向, 来描述经济人与经济组织的价值取向异同对合作的影响, 这就是公式 (1) 中的 $\cos \alpha$ 项的作用。显然, 只有当 $0^\circ \leq \alpha < 90^\circ$ 时, 才有可能进行合作。

可见, 经济组织与经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力既有相互吸引的合作力, 也有相互排斥的分离力, 其实际结果是,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经济活动参与方之间的价值取向趋同程度越高, 合作力越大, 价值取向趋同程度越低, 合作力也越低, 当价值取向的差异程度达到一定限度时, 合作将难以实现。由此可见, 资本要素的有机配合是组织合作的基本动力, 而要素拥有者的价值取向差异性则是组织合作的制衡力, 从而使组织维持在一个动态的稳定状态。因此, 对于每个组织都有一个合适的规模。

由于合作者的价值取向不同, 产生了合作的制衡力, 因此, 一个组织要正常发挥作用, 必须有足够的凝聚力。为了分析这种能力, 在此引入组织信息场的场强 $\vec{E}$ 的概念。组织信息场的场强 $\vec{E}$ 只与组织的资本量 Q 及所处位置有关, 其方向为组织的价值取向即单位矢量 $\vec{V}_Q$ 的方向, 在组织信息场的场强分析中, 可将其作为基准方向, 并设该方向为指向组织自身, 即为向心力方向。则组织信息场中的场强为:

$$\bar{E} = k \frac{Q}{r^2} \cdot \bar{V}_Q \quad (2)$$

组织信息场强度表示该组织对于周围空间中各个节点发送合作信息能力强弱的物理量。公式(2)表明,组织必须拥有一定的资本量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合作信息场,从而吸引更多的合作者参与到组织中来。当经济人进入到组织信息场的影响范围时,就会感受到组织的合作信息场强 $\bar{E}$ 的作用,从而得到了该组织的资本量 and 价值取向等有关合作的信息。如果该信息强度超过经济人的合作阈值,则经济人就会做出进一步沟通交流的努力,即减小公式(1)和公式(2)中的信息距离 r ,从而使场力和场强进一步增加,如果场力超过组织的合作阈值,就可能促成实质性的合作发生。

(四) 信息经济人假设下的组织结构模型

信息经济人的基本假设是:经济人主动寻求与其他经济人或经济组织的合作,并且依据经济人与组织之间的资本量信息和价值取向信息进行选择合作。经济组织是由相互合作的经济人组成的,经济组织的资本量信息和价值取向信息是所有合作者相关信息的综合体现。由于组织中各个经济人的资本量和价值取向不可能完全同质,因此,各个经济人对组织的作用是不同的,组织中经济人之间的合作程度也有较大的差异。依据组织中经济人之间的合作程度,运用组织信息场模型,可以认为,经济组织是一种分层组织,分别由核心层、中间层和外围层组成,其组织结构及信息场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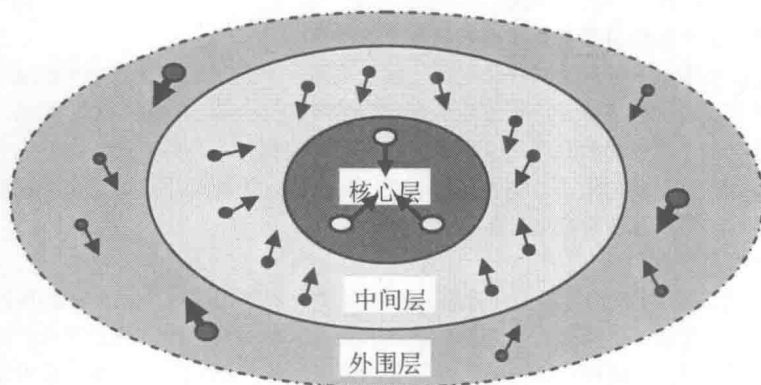


图2 组织结构及其信息场示意图

1、组织的核心层

组织的核心层是由价值取向完全相同并具有足够资本量的经济人合作组成。或者说,核心层是由个人价值与组织价值完全契合的个体组成。例如,组织的发起者往往是构成组织核心层的基本成员。核心层确定了组织的任务和目标,并明确了组织的价值取向,同时,核心层的资本量大小也基本确定了该组织信息场的作用范围。

2、组织的中间层

组织的中间层是由众多与组织价值取向较为接近的经济人组成,这些经济人具有实现组织功能所需要的一定资本量。例如,通过雇佣合同加入到经济组织中的经济人往往构成组织中间层的主要成员。中间层是组织的骨干,组织的主要功能是在中间层实现的。

在很多情况下,要实现组织的目标,单靠核心层是不够的,还需要众多的合作者共同努力。在参与者众多的情况下,要求所有参与者都与组织的价值取向完全契合是不现实的,因此,在核心层的吸引下,将与组织价值取向较为接近的经济人吸引到核心层周围,从而构成了组织的中间层。显然,经济人自身资本量大小以及价值取向与组织的一致程度,决定了经济人与组织的合作程度,经济人的资本量越大,其价值取向与组织的价值取向越接近,与组织的合作力也越大,个人与组织的合作越紧密,个人在组织中的位置就越接近组织核心层,对应于公式(1)中的 r 越小。反之,则远离组织的核心层。

在中间层中,合理的管理机制可以使组织中相邻经济人的信息沟通更加便利,即信息距离 r 缩短,组织内部的合作力加强。信息沟通的增强使组织在工作任务调节中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能够及时响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中间层的加入会增加组织信息场的场强,扩大组织的影响力,但是,由于中间层价值取向与组织价值取向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这种影响是有一定限度的,不会无限增加下去。一个稳定的中间层是

组织功能实现的基本保证,因此,对组织信息场强度的基本要求能够保证形成一个稳定的中间层组织。即,在公式(2)中,当 r 到达组织中间层的外围时,组织信息场的场强 $\bar{E}$ 仍然有足够的强度和清晰的方向性。

3、组织的外围层

组织的外围层是由价值取向与组织价值取向有一定的差异,但又与组织存在一定的利益互补性的经济人或其他经济组织组成,它们与组织形成一种松散的合作关系。例如,经济组织通过各种契约与其他经济人或经济组织进行长期、短期或者一次性合作。

外围层出现的原因是: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庞大的中间层会产生更多的管理层次,使信息传递的总体路径增长,而 r 的增加必然会削弱组织信息场的场强和场力,因此,对于不同的中间层管理方式以及不同的核心层的资本能力,组织具有一个合理的中间层边界,但在中间层以外,组织仍然会产生与其他经济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合作交流的需要,这就构成了组织的外围层。在外围层,由于信息距离 r 的增加,组织的信息场场强 $\bar{E}$ 的强度和方向的清晰性都会有所削弱,因此合作的难度增加。但是,外围层的存在是经济组织开放性、合作性的必然体现,组织之间的合作大多是在外围层展开的。因此,成功的经济组织必须设法在组织的外围层保持足够的合作信息场强度。

显然,图 1 只是一个一般化的结构模型,实际的经济组织结构模型具有多种不同的变体。例如,不同企业的核心层、中间层与外围层三层结构的比例就有较大的差异,而市场作为一种松散的经济合作组织,可以将其视为只有外围层的一种组织形式。

三、我国农产品生产组织模式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联

我国农产品生产规模过于分散,产业化组织化程度不高,不仅制约了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而且使政府无力对农产品质量进行有效监管,导致近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频频发生。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各种促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的农产品生产组织模式,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企业+农户”模式、“企业+直营农场”模式(全产业链控制模式)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下面运用组织信息场模型对这三种模式逐一进行分析,探寻其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

(一)“企业+农户”模式

“企业+农户”模式是指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在适合生产优质安全农产品的地区,同分散的小规模农户签订合同,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提供农药、化肥、种子等生产资料,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派遣技术人员对农户进行指导,并收购全部产品。在这种模式下,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通过与农户的契约关系,将分散经营的农户组织起来,进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和一体化经营,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集约化,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从理论上讲,可以通过契约将合作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明确规定下来,因而与农产品质量相关的诸多因素,如农产品生产操作标准、管理标准、农产品质量检验标准、以及合格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等,都可以明确地以契约方式确定下来。但是,契约的可自我实施性取决于合作双方之间的合作力大小。如果双方的合作力不够大,即使签订了合作协议,也随时可能会因外部条件的变化而撕毁协议。除非此时由强有力的第三方来监督协议的执行,但是,任何第三方的介入都是有代价的。由此可见,在这种方式下,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否有保障,主要取决于双方合作力的大小。

在“企业+农户”模式中,农户通过购销合同与企业结成了某种联盟或者协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是一次性的,既包括口头承诺的形式,也包括书面协议的形式。从信息经济人假设的组织结构原理来分析,此时农户处于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的外围层。在外围层,由于信息距离 r 较大,因此,企业信息场的场强 $\bar{E}$ 较弱,意味着企业对农户的吸引力及控制力都很有限。从另一方面讲,农户的资本量是有限的,即公式(1)中的 q 较小,从而使场力 F 的数值较小,有可能达不到合作阈值。如果企业与众多农户之间交易的是标准化的同质产品(或服务),那么这种模式可以正常运行。因为,对于标准化的同质产品或服务,其产品信息包括价格、性能和质量信息都是易于获得的,这些信息其实是与合作相关的最基础性的信息,如果这些基础信息可以低成本地直接获得,相当于组织合作信息场常数 k 较大。根据公式(1)可知,在同等条件下,对于标准化的同质产品或服务,经济人与组织之间的合作场力将明显增大,有可能超过合作力的阈值要求。而且,由于标准化的同质产品或服务的信息易于获得,由第三方监督实施的成本也相对较低,所以,合作的成功率较高。

然而,在“企业+农户”模式中,众多分散的农户向企业提供的农产品并不是标准化的同质产品,由于消费者在购买、消费农产品之后往往并不能对其质量安全特性做出准确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产

品属于信用品,此时农产品的质量保障依赖于农户的声誉,而农户的小资本特征使其很难建立起有效的声誉^[6]。

虽然企业会向农户提供标准化生产的规范和产品质量指标要求,但农户是否按照这些标准生产,以及所提供的农产品是否达到要求的质量标准,却无法用简单的方法低成本地进行验证。不仅企业无法低成本地获取农户的农产品质量信息,农户也同样无法低成本地向企业传递产品的质量信息。因此,组织中与合作相关的最基本信息的直接传递出现困难,需要借助于资本量信息、价值取向信息等其他信息来传递经济人与组织之间的合作信息,与标准化的同质商品或服务相比较,这相当于企业与农户之间的信息场常数 k 减小。从公式(1)可以看出,这将削弱处在外围层的小规模农户与企业的合作力。而且,面对众多分散的农户,其价值取向必然是分散的,很难与企业保持较好的一致性,因此,企业与农户的合作力非常薄弱,契约关系非常不稳固,这种模式的实际运行也验证了上述分析,农户或企业单方面撕毁协议的情况屡见不鲜^{[7][8]}。而合作的不稳定使农产品质量控制难以可靠实施。

在“企业+农户”模式中,农产品的生产是在企业的外围层实现的,农产品的深加工及流通销售是由企业的中间层实现的。显然,对于外围层生产环节的控制,也就是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源头控制,是这一模式的薄弱环节。三鹿集团在 2007 年的奶牛饲养规模达到 22 万头,奶牛饲养扩展到了 100 多个县(市、区),涉及 3.8 万多农户、40 多万农民^[9]。而国内某著名肉制品企业年产量 8000 吨,他们有 12 个养殖基地,3 万多户养殖户为其提供生猪^[10]。由此可见,在这种模式下,核心层必须具有强大的能力才能与如此庞大分散的外围层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实际上,企业很难对如此众多的分散养殖户进行有效的质量监控。而且,由于农户的生产规模太小,即使借助第三方来强制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协议,其成本也过于高昂,难以真正实施。2008 年爆发的震惊全国的三鹿奶粉掺杂三聚氰胺的恶性事件也说明,这种组织模式在农产品质量控制上存在严重的缺陷。

当然,这种模式也并非没有进一步改进的可能,因为上述分析是基于核心企业与众多分散农户之间存在过于分散的价值取向的前提条件,仅仅依靠资本的力量,通过管理手段和技术手段来改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其分析结论与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即由于信息成本的制约,这种农产品市场组织模式不可能有效地改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如果能够改变这一前提条件,即通过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来改变核心企业与农户之间过于分散的价值取向,那么企业与农户合作的稳定性自然会显著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也会显著改善。具体来讲,可以通过核心企业有目地的推进农产品供应链组织文化建设,逐步将分散农户纳入稳固的供应链组织文化的约束之中,从而利用文化的力量、道德的力量来加强合作。这是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唯一方法,但是这种方法的使用需要足够的时间,道德文化的扩张,不能像资本扩张一样立竿见影,而且道德文化力量的运用也需要核心企业对管理模式做相应的变革。

(二)“企业+直属农场”模式

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为了确保产品安全和供应的稳定,投资建立自己的直属农场。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租赁农民的耕地,雇佣原耕地上的农民,使原来农户在保留土地使用权的同时又成为领取工资的农业工人。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通过直接管理农场的整个生产过程、农药和兽药的使用以及质量控制,确保农产品的质量达到国家要求的标准。目前已经有一些企业采用此方式成功运作自己的农产品产业链,比如:山东省莱西市的九联集团、莱阳市的龙大食品有限公司、龙口市的复发中纪有限公司、莱西的三丰集团公司、上海的新成食品有限公司和高榕食品有限公司等^[11]。三鹿事件发生后,这一模式更成为拯救我国乳品业乃至提高我国整个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一大利器。国内两大乳品加工企业伊利、蒙牛在三鹿事件后都迅速做出了反应,除了在生产及销售领域加强监管以外,在源头奶牛的饲养以及挤奶环节都进行了相似的变革——按照自营农牧场的思路,组建大型养殖基地,实现牧养产业化,并积极通过各种媒体不断宣传这一举措(2008 年 12 月 16 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19 点新闻联播节目的相关报道)。而中粮集团则在近几年大力实施农产品的全产业链控制,并积极宣传其全产业链质量监控体系。

从信息经济人假设下的组织结构原理来分析,“企业+直营农场”模式实质上是农产品的生产环节内置到企业的中间层来实现。显然,在中间层,由于合作加强,质量控制容易实现。但是,与“企业+农户”模式相比,就相当于将企业的中间层扩大至外围层,这对企业核心层所能构建的合作信息场强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核心层要拥有更大的资本量才能维持扩大了中间层的合作力。而且,农产品产业链长,涉及环节多,全产业链控制虽然有利于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但是投入较大,这实际上是一种垂直一体化的经营模式,是以企业内部管理或企业内部交易替代市场交易。其显著优点是:企业可以把农产品生产的

全过程直接置于自己的计划和管理之下,农产品质量安全可以实现全过程控制,包括对农产品生产的原料及中间投入物进行控制,制定详细的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生产规范和操作标准,以及对农场员工进行有计划的技术培训等等。但是,对于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来讲,在得到农产品质量控制效率的同时,则要面对垂直一体化管理模式的种种弊端,这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养、组织管理效率的提高都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在我国人多地少的情况下,这种直接产业化的模式使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所付出的土地征用或租赁成本以及原有耕地农民的安置成本等都非常高昂,考虑到企业的资金回报率问题,这种方式只适合某些特定环境,并不适宜大范围推广。

目前,世界上的企业组织模式正处在由一体化向战略联盟转变的热潮中。从企业组织模式的发展历程来看,在现代企业的发展初期,有许多企业的迅速崛起是通过商业资本与手工作坊之间的合作实现的,也就是第一次外包业务,这时期的合作规模较小,组织结构只有核心层和外围层,基本没有中间层。由于整个组织的规模不大,因此,组织功能的重心虽然在外围层,但核心层仍然能够进行有效的协调,以保证组织功能的实现。而当组织规模扩大后,核心层与外围层的协调信息量急剧增大,组织效率降低。为此,当组织核心层拥有足够的资本后,就会构建强大的、组织严密的中间层来替代原先的外围层所承担的功能。在中间层,科层组织的协调能力加强,组织内部的价值取向趋同化明显,信息传递效率和组织效率提高。当组织再次扩大时,中间层的信息协调也会出现问题,由此出现了二次外包现象,即将部分原先在中间层实现的功能剥离到外围层来实现。这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标准化的同质产品或服务,由市场交易来提供,另一类是专业化的产品或服务,由具有战略伙伴关系的分包商来提供。企业通过剥离非核心业务来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和组织运作效率。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直营农场”模式并不是一种组织效率最高的农产品生产模式,全产业链质量控制模式可以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但成本很高,不能够在我国所有农产品进行全面推广。从供应链管理的角度来看,农场最好是由农民自营,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与农场结成战略合作伙伴。

(三)“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

自从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生产得到了巨大发展。但是,家庭承包经营具有明显的小农经济特征,使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增收受到限制。由此提出了通过农业合作化组织或农民协会来促进农业产业化这一措施,并逐步开始实施。

2006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7年7月1日起实施。从此,中国农民的合作社有了合法身份,能够作为市场主体之一与其他类型的经济实体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开展经济活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和实施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总体发展呈现加速态势,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12]。目前看来,我国农户的生产经营规模普遍较小,即使将农户组织起来,其经济实力也比较单薄,无法实现农产品全产业链的运营,因此只能采用“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进行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销售这一产业链运作。合作社的组织功能主要表现为降低经济活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取得规模经济和打破市场垄断。所带来的组织收益主要表现为降低交易成本的收益,规模经济收益,减少不确定性及规避市场风险的收益,维护社员经济地位的收益。而这些组织收益的获取,主要就在于多个经济及社会能力弱小的社员的互助联合^[13]。

国际合作社联盟成立100周年大会(1995年)提出的“合作社基本原则”(也称“曼彻斯特原则”),主要内容有七点:一是自愿和成员资格开放;二是民主的成员控制(基层社实行一人一票;其他层次的合作社,也按民主方式组织);三是成员经济参与;四是自治和独立;五是教育、培训和宣传;六是合作社间的协作;七是关心社区^[14]。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立法原则与上述国际合作社基本原则相吻合,强调一人一票的决策机制,强调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原则,以及限制资本股分的权力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十七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大会选举和表决,实行一人一票制,成员各享有一票的基本表决权。出资额或者与本社交易量(额)较大的成员按照章程规定,可以享有附加表决权。本社的附加表决权总票数,不得超过本社成员基本表决权总票数的百分之二十。第三十七条规定:可分配盈余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百分之六十。)这些基本原则的确立,使农民专业合作社成为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经济组织。

从信息经济人假设下的组织结构原理来分析,按照上述原则构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没有核心层,而以中间层为主构成的经济组织。合作社中每个成员拥有的资本量较小,且价值取向相近,也就是说,经济组织中的成员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在这种条件下,合作社可以集合社员分散的资本,从而形成具有相

当资本量的经济组织,成为农产品产业链中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进而与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进行深入合作,构建高效率的农产品供应链管理体系。适度的生产规模和先进的管理模式能够使农产品生产者获得稳定的良好收益,同时可以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合作社运行的良好效率,是以社员的同质性作为前提条件的。如果社员完全同质,就具有完全相同的价值取向,这时,对社员的资金规模没有限制,对社员数量则是多多益善,因为在价值取向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合作社内部社员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几乎没有成本,社员之间能够形成牢固的内部合作关系,这种内部合作关系不会因为会员数量增多而减弱。而社员的数量越多,合作社汇集的资本量也越大,合作社组织的信息场也越强,容易与其他经济组织开展深度合作,特别是与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进行合作,从而构建高效率的农产品供应链管理体系。但是,社员绝对的同质性是不存在的,只能是相对的同质性。而社员的异质性特别是价值取向的异质性,表明合作社内部社员之间的信息交流是有成本的,合作是有限度的。困扰合作社理论的“搭便车”问题和“激励不足”问题,实质上都是信息问题,是由于信息成本的存在使内部社员之间的合作信息不能够充分交流,导致合作信息场的强度不够,协调效率降低,甚至合作失败。

社员之间价值取向具有一定的异质性,也使合作社组织成为一种以中间层为主要结构的经济组织。由于缺少具有强大资本量的核心层,因此合作社对于社员的异质性特别是价值取向的异质性非常敏感,或者说,缺少核心层的中间层组织是一种比较脆弱的合作组织,而只有首先保证合作社自身内部的稳定合作,才能使其在市场经济中发挥良好的作用。这对合作社的最佳组织结构会有较多的限制,特别是合作社的规模(社员数量)以及普通社员所具有的资本量大小等都有一定的限制。社员价值取向的差异性与合作社规模成反相关关系,即社员的价值取向差异越大,合作社的最佳规模就越小。因为价值取向差异越大,社员内部信息交流的成本越高,内部合作力越弱,当社员数量过多时,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突出,最终会导致合作失败,合作社解体。

由于对社员数量有一定的限制,因此,每个社员的资本量不能太少,否则,合作社的总体资本量会过于薄弱,难以建立起强大的合作信息场,影响组织的运作。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增长很快,但良莠不齐。其中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农民的资本量偏小,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化经营程度,需要较多的农户共同参与合作社。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农民价值取向的一致性是有限的,当社员数量增多后,合作社的运作效率会明显下降。这一问题对于质量控制要求较高的农产品来说就变得更加突出,因为高质量的农产品对生产过程有严格的质量控制要求。比如,为了保证农产品的可追溯性,会要求以农民个体或组织的形式记录生产过程中的农药、化肥、水等要素的投入量,并作为产品的质量信息提交给经销商。在分散经营的方式下,如何保证合作社提供的质量信息是可信赖的,首先在合作社内部必须保证生产活动的一致性,即内部必须保持良好的稳定合作关系。在合作社社员价值取向存在差异、又缺乏核心层强有力的控制情况下,要保证内部良好的合作关系,必须考虑内部合作信息交流的有效性限制,因此,需要交流的合作信息越多,合作社的基本规模则越小。从肯尼亚豆出口的案例来看,当欧盟提高食品安全标准后,肯尼亚进行合作生产的农民小组成员数量锐减,每个小组成员数量从原先的多至 350 个减至 30 个,以保证第三方监控和小组内部监控的有效性^[13]。对生产规模的限制,则可以通过合作社的联合来解决,这在国外的合作社发展过程中都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借鉴^{[13][15]}。

缺乏核心层的问题,不仅会影响合作社的凝聚力,而且在合作社的发起过程中会遇到很大的阻碍。如何有效地将农民组织起来进行规模化生产,除了充分发挥农村中“能人”的作用,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扶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利用合作社所成员所天然具有的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积极推进合作社组织文化建设,凝聚合作社的价值取向,利用道德文化的力量来约束社员的合作意识,则可以显著提高合作社的凝聚力,增强合作的稳固性。

四、结语

本文的出发点是:合作是人类社会的共识。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大多从合作的愿望出发组成各种组织,并在组织中付出各自的努力。最终结果可能是合作成功,也可能是合作失败。影响组织合作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信息,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对组织的合作成效有直接影响。然而,信息的发布和获取是有成本的,正是由于信息成本的存在,使合作信息成为稀缺资源,而过高的信息成本也是虚假信息产生的原因之一。本文提出的模型是用资本量 and 价值取向等信息来表述合作信息,就是为了尽量减少信息成本对合作分析的影响。也使本文在模型分析中提出的组织中没有虚假信息的假设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当然,这还是一种理想化的近似假设,但是,一个运作良好的经济组织体系却是可以有效降低信息成本,从而有效限制虚假信息的产生与发送。

在经济活动中,经济人总是努力地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和与合作方式,这个合作伙伴可以是其他经济人,也可以是一个经济组织,一旦找到合适的合作组织,经济人就会努力做出自己在组织中的应有贡献,并分享组织的收益。成功的合作会给合作者带来稳定的收益,一旦经济人发觉当前的组织已经缺乏合作前景,那么,退出该组织,寻找新的合适的组织进行合作便成为唯一正确的选择。通过发布虚假合作信息,采用欺诈手段为自己谋利等行为是一种短视行为,是明显得不偿失的行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只能是缺乏合适的合作伙伴。因此,一个正常的经济组织体系应该能够提供足够多的合作机会,从而有效阻止虚假合作信息的发布。而一个运行效率低下的经济组织体系,则难以提供足够的合作机会,从而出现虚假信息满天飞的现象。从这一角度出发,在分析经济组织运行机制时,就需要考虑合作信息的传递问题,如果能够保证合作信息的有效传递,虚假信息也就没有市场了。另外,加强文化道德建设,让合作更多地依赖价值认同而不是仅仅依赖利益计算,也可以有效抑制虚假信息的发布。

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与我国农产品生产组织模式密切相关。粗略地看,我国农产品供应市场是竞争性的,有时局部还会发生过度竞争现象。但是,严格地讲,我国农产品市场提供的产品并不是标准化的同质产品。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每个农户所提供的农产品质量可能有较大的差异,也可以说,每个农户都是一个垄断竞争的农产品供应商,其拥有自家生产的农产品质量信息。但是,如何将这一信息有效地发布出去?信息发布是需要成本的,高品质产品的质量信息发布需要更高的成本,如果农户不能承担这一成本,则提供高品质农产品的合作愿望就可能落空,这是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信息瓶颈所在,也是目前我国在推进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信息的不完整、不确定,使得基于利益计算的合作的稳定性受到动摇,导致合作难以成功。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组织创新来解决农产品生产合作的信息瓶颈,并通过积极推进文化建设、道德建设来增强合作的稳定性。

应当看到,以目前的技术水平,对于信息瓶颈问题,只能适度改善,而无法彻底解决,只能以合理的成本提供必要的信息,而无法提供全部的信息。因此,要积极推进农业产业的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特别是农产品供应链的组织文化建设,增加农产品供应链内部各个成员之间的组织认同感,让农产品供应链上的合作方式由基于利益计算的初级合作模式,向基于组织认同感的高级合作模式转变。如果农产品核心企业能够建立一个稳定的包括农产品生产者和农产品消费者在内的一个农产品供应链组织文化,则基于组织认同感的合作必然可以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参考文献:

- [1] 何勇. 人民时评:“道德血液”不应缺失. 人民网《人民日报》,2008年10月23日,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8215565.html>
- [2] 张敏. 保护弱势群体与社会信用机制的构建[J]. 改革, 2008(3).
- [3] 刘育英. 温家宝答农民委员“九盼”称企业家要有道德血液. 中国新闻网,2010年03月0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3/05/content_13099880.htm
- [4] 赫伯特·西蒙[美]. 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有限理性说[M].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 [5] 谢树艺. 工程数学——矢量分析与场论[M].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3.
- [6] 赵亚翔, 高素英. 农产品市场“柠檬”问题的解决——一个基于食品质量安全视角的文献综述[J]. 中国农学通报, 2010(10).
- [7] 姜长云. 防范订单农业运行风险[J]. 政策, 2003(4).
- [8] 尹洪东. 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合同危机”. 新华网山东频道, 2003年11月6日, http://www.sd.xinhuanet.com/news/2003-11/06/content_1157928.htm
- [9] 余音, 苗万福. 三鹿是如何快速崛起的[J]. 饲料博览(管理版), 2008(01).
- [10] 刘俐, 张宇峰. 我国食用农产品供应链优化与控制关键因素分析[J]. 物流技术, 2007(5).
- [11] 胡定寰, Fred Gale, Thomas Reardon. 试论“超市+农产品加工企业+农户”新模式[J]. 农业经济问题, 2006(1).
- [12] 张晓山.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趋势探析[J]. 管理世界, 2009(5).
- [13] 国鲁来. 合作社的经营规模与组织效率[J]. 农村经营管理, 2005(9).
- [14] 柴效武, 叶益东. “农业合作社+农户”——农村制度变迁过程中组织模式的抉择[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4).
- [15] 霍尚一. 集体行动、公私伙伴关系与小农市场准入——肯尼亚豆出口的案例分析[J]. 农业经济, 2009(12).

Research Summary Report
Professor Robert Lynn Ogden
Department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Huizhou University
December, 2011

Lynn

(惠州学院 经管系 广东 惠州 516007)

Academic Paper Topic:

Utilizing Macroeconomic Anecdotal Trend Analysis for Future Forecasting **Purposes**

Background

Much of the current academic literature in macroeconomic trend analysis and forecasting requires significant reliance on gathering economic data that is too "dated" by the time it is available in a verifiable and comprehensive manner. For example, data on economic sectoral results are often one, two and three years out of date before they become available for analysis in a detailed and professional manner.

Trends having increasingly shortened time horizons and predictability based upon past macroeconomic activities. Big picture macroeconomic trends can sometimes be determined by analysis of such dated data as are available on a belated basis.

However, while this is valuable for global, regional or country analysis and forecasting, it tends not to be very useful to the individual industry or business or to the local and even provincial governments who struggle with taking country data and trying to determine what that means for their locality or individual business.

Why Anecdotal Trend Analysis?

Anecdotal Trend Analysis seeks to provide future forecasts for up to 20 years into the future that are helpful for strategic planning purpos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individual firm, the regional city government and the appropriate provincia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mpacted by macroeconomic trends.

Anecdotal Trend Analysis can be useful to predict such important strategic applications of such things as labour market future demand and supply; impacts of central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t the local level; futur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arket demands; manufacturing price and material future trends; age, sex, population, income buyer/seller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and, so on.

Anecdotal Trend Analysis is very useful for anticipating policy demand areas for future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ticipating sectoral shift impacts on local and regional economies; and, for use by individual firms for the purposes of adjusting strategic directions and potential obsolescence

Challenges of Using Anecdotal Trend Analysis

From an academic point of view, anecdotal trend analysis requires considerable knowledge of economics, demographics, media and data analysis and timeliness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order to be of value as a strategic forecasting tool. From other countries, there are some significant academic books and articles that indicate methodologies suitable for studying such problems within China.

The published research paper will include references so several of these "model" studies from Canada, USA, OCED, IMF, ADB, World Bank, and the Economist Research Advisory. A full bibliography will also be included of other references categorized by type of media/ source.

Measurements of likely reliability are perhaps most challenging because often what works in one jurisdiction has to be adjusted to be sensible in another jurisdiction.

Often the information on trends, data and even media, may have systemic bias in favour of some other important objective and may not have been collected in a manner considered reliable for the

purposes of anecdotal trend analysis.

Contextual information – a very important factor in Anecdotal Trend Analysis – is often now fully known at the time of the commentary and analysis. This an initial estimate of reliability of such analysis is that it portrays a useful and usable two thirds of the future scenarios.

Based on the current lack of reliable macroeconomic trend analysis, this is a significant step forward in forecasting of this nature but it is certainly not the complete answer by any means.

Much macroeconomic data, information and media tends to be backward looking and then used to do technical calculations based on assumptions about continuity, consistency and direction that in the 21st century often do not apply.

Change, it is said, is a constant. For the 21st century, we may say dramatic or tsunamic change is the constant.

Status Report on Where the Present Research is Now

Four speeches have been made to public audiences over the last three years to test some of the methods of anecdotal trend analysis in the Huizhou City and Guangdong Province areas utilizing global and country trends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impacts on these areas.

The first speech was given in 2008 to an audience of 300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people in Huizhou City; this was a mixed audience of both leaders and workers from Huizhou.

The second speech was given to the Tsinghua University/CEO Association audience in Huizhou of about 400 people. This audience was more focused on leaders and the strategic factors that leaders might consider.

A third speech was made to academic colleagues within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an audience of about 65 professional people with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Economics and related subjects.

The fourth speech was given for a group of students and municipal leaders and mid-level cadres interested in macroeconomic impacts on strategic plans for Huizhou for the future – an audience of about 150 people.

[Note: The inclusion of the students, while very interesting and informative, meant that the municipal personnel were not able to ask and get answers to as many questions as was hoped, as the students tended to ask more questions than the municipal leaders and the student questions were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ir age, marital and educational status.]

Further small focus group meetings are planned to ask specific questions of specific sectoral representatives.

Research information and data has been gathered from loc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media, web sites, on line data,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government policy statements, economic, social, legal and regulatory, sectoral, industrial, and other significant trends and forecasts.

More than 50 Visits have been made to trade fairs, local exhibitions, other c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s and differences noted between and amongst different areas, sectors and activities.

Special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balance the media and data gathered by collecting not only English language commentary (although that forms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data and information collection) but also from translated Chinese sources, and other languages as well.

It is estimated that a preliminary draft of my research paper should be completed in the next two to three months and then will be circulated to academic colleagues for their commentary and suggestions.

重视和强化学生社会实践和学术（专业）竞赛

胡瑞卿

（惠州学院 经管系 广东 惠州 516007）

一、加拿大学习考察之感想

暑期在加拿大 BC 省卡普兰诺大学（简称卡大）学习考察 20 天，感受很深，收获颇多。

卡大的行政管理效率很高，校园环境洁净优美，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但作为专业教师我感受最深的有以下两点。

一是卡大的小班教学。卡大教学班级的学生一般不超过 30 人，教学方式比较灵活，教师可以很好地启发和引导学生，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可大大调动起来。因此，这种小班教学方式可产生良好的师生互动效果，加固所学知识。

二是卡大强力推动学生积极参加社区实践活动。学生在卡大学习期间，教师和教务管理人员努力推动学生充分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与社区相关业务或活动结合起来，进行一些社会实践活动，期间教师、学生、实习单位经常一起共同讨论相关问题，以促进教学和实习质量的提高，毕业后部分同学就留在实习单位工作。因此，这种课堂与课外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可使理论与实践互动起来，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同时也可使学生更快的成就事业。

从加拿大回来，我在思索：我校是否可以学习和借鉴卡大的“小班教学”和“社区实践”的经验呢？

结合我校的实际，“小班教学”是行不通的，因为成本太高，我校财力无法支撑。卡大每位学生的学费是我校的七、八倍，甚至十多倍。然而，增强师生互动性，启发和引导学生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和努力推进的。（这个主题本文不做研究）

卡大的“社区实践”效果很好，他们的经验值得我校借鉴和学习。然而，依据我校近几年的发展状况、目前的师生力量、有关部门对我校的支持以及社会各界提供的大环境，我校的社会实践和各类竞赛活动应该比卡大做得更好。

二、我校学生社会实践与学术（专业）竞赛优势与问题

（一）优势

我校具备一些卡大无法比拟的优势，主要以下七个方面。

一是我校社会实践的覆盖面更大。它不仅仅局限于当地社区，还覆盖惠州全市各县区的各个领域，甚至全省，乃至全国。

二是我校有一支更为庞大的覆盖面更广的学生管理队伍。即学生处、团委、教务处、各系部书记和辅导员、班主任、任课教师等组成，不只限于教师和教务处，而且拥有的教授、博士比例也比卡大高得多。

三是我校与学生讨论更为方便。我校对学生实施全日制管理，教师也住在学校教师村或学校附近，能够更方便地与学生进行集中式的面对面的讨论；而卡大不提供学生和教师住宿，他们一般居住得比较分散。

四是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对我校支持力度更大。惠州市政府官员、部门领导、企业成功人士经常光临指导，并常常给予经费赞助或项目扶持。我校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惠州唯一的一所高校——独生子），而在温哥华高校林立，世界名校、全国名校均拥有，对于一个只有六、七千在校学生的社区院校（卡大）的重视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五是我校办学定位更高。目前，我校是一个以“教学为主，教学与科研齐头并进”的培养拓展型、应用型、创新型高级人才的高校，并且我校还有一个目标即培养一批专业硕士。而卡大基本上可以被认为只是一个教学型高校。

六是我校发展势头更强劲。自 2001 年我校专升本以来，进行了大幅度的教学改革，梳理和解决了许多制度上、体制上的问题，办学水平逐步提高，尤其是近几年来，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办学目标更加清晰，更为合理，更为高远，并且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这些既定的目标前进，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发展势头比卡大更强劲。

七是我国各有关管理部门及社会各界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多的竞赛和创业机会。由于我国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实施应试教育，给学生的社会实践和创造力的发挥设置了制度障碍。国家为了矫正由于高考体制带来

的弊端,号召大学生多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多参加一些竞赛活动。我国各有关管理部门及社会各界为竞赛和创业提供了很多机会。如由各级共青团、科协、教育主管部门、学联和政府联合举办的大学生“挑战杯”大赛,被誉为当代大学生科技创新的“奥林匹克”盛会,每年在各大大学、各省(市)及全国举行,由教育部高教司和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共同主办的全国数学建模大赛等;另外,还有许多全国性的、区域性的、行业性的、专业性的大赛,如美术作品大赛、建筑设计大赛、服装设计大赛、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大赛、摄影大赛、南方新丝路模特大赛、旅游形象大使大赛、海报设计创意大赛、化工设计创业大赛、动漫设计大赛、市场调研大赛、职业经纪人大赛等;此外,还有各种基金会提供的大赛,如富强基金大学生创业大赛等。

近年来,我校社会实践成效显著,在国内各类比赛中也不断取得佳绩,甚至在有些国际性比赛中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如 2011 年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我校获 4 项一等奖、1 项二等奖、5 项三等奖,在 2011 年获国际城市旅游小姐中国总决赛我校同学获冠军,在 2009 世界比基尼小姐总决赛中我校同学获冠军等。

(二) 问题

我校近几年的学生社会实践和学术(专业)竞赛确实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与我校具备的以上七大优势比,与我校特色办学目标比,我们做得很不够。此项工作还未成气候,离步入常态化的工作管理还相距甚远。主要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覆盖面小。目前我校学生社会实践与学术(专业)竞赛工作,仅是少部分系开展得较好(如经济管理系、数学系、服装系、电子系、美术系、建筑与土木工程系),但这些系也未大面积开展起来。

二是重视不够。学生社会实践与学术(专业)竞赛是特色办学和培养高素质的拓展性、应用型、创新型人才最重要的手段,但这些工作似乎只见其大力提倡,而少见其实质性的落实。说到底,它并未像教学和科研工作那样抓得紧、抓得牢,得到上上下下的重视,并使之长抓不懈。

三是学生热指导冷。我校绝大部分学生渴望经受社会实践的锤炼,渴望创业、创新,渴望在各类比赛中获佳绩,他们表现出满腔热忱,但却经常为寻找指导教师发愁。据学生反映,几乎每年愿意花大力气来指导学生此项工作的教师均是寥寥无几,其推辞多为“对此项工作不熟悉”或“太忙没时间”。究其原因,主要是学校缺乏一套相应的鼓励(奖励)机制。教学计工作量,超工作量另计薪酬;科研也计工作量,超工作量也另计奖励;而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指导学生为学校争得荣誉、为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各类学术(专业)比赛作品,历年来都不计工作量,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奖励措施,甚至许多获奖作品在学校网页通告栏里连指导教师挂名也被略去。每年我们经管系几个“有经验”的教师,都是被系里领导以身作责的鼓动、带领和学生高涨的热情所驱动,硬着头皮克服重重困难共同迎接各类比赛和挑战。其它几个做得较好的系,想必也是如此。

四是学生经费报销不畅。我校财力有限,学生竞赛作品的前期调研等费用应以自筹的方式解决(除已立项的课题外),但一旦作品走出校门,被推选参加各类竞赛活动所发生的费用,不应由学生来承担。但我校学生作品外出竞赛所发生的费用,其报销常常不太顺畅,很多由学生垫付半年甚至更长而得不到解决。

五是学生参赛作品对地方特色挖掘不深。由于缺乏老师系统深入地指导,学生的参赛主题大多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对具有惠州地方特色的主题挖掘不深,拓展不宽,难以形成系列的独特的作品。

三、强化我校学生社会实践与学术(专业)竞赛的主要措施

学生社会实践与学术(专业)竞赛是继教学、科研后的又一大任务。如果说培养拓展型、应用型、创新型高级人才是我校的办学目标,则学生社会实践与学术(专业)竞赛是实现这一目标最有效的手段和途径。重视和强化这项工作,撑起我校特色办学的另一片天空,其主要措施有以下三点。

一是各有关部门和人员高度重视,使之常态化。从校领导到部门领导再到系领导,最后到专业教师都应该十分重视,赋予它与教学、科研同等重要的地位,大面积地开展起来,使之常态化,而不是一阵阵的运动式的活动。

二是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尤其是奖励制度,以提供长效机制。光凭着领导的鼓动和少数指导教师的义务奉献,是不能使学生社会实践和学术(专业)竞赛活动有效地长期地持续下去的,应有相应的制度尤其是奖励制度作保证,来认可、表彰指导教师的辛勤劳动和成果,来理顺相关工作和学生经费报销程序,消除学生和指导教师的后顾之忧。在学校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可暂时考虑只奖励获奖作品和推荐参赛作品,具体办法可参照科研管理条例。笔者以下建议也可供参考。